

外国学者笔下的传统中国

The Ghost Festival in Medieval China

Stephen F. Teiser

〔美〕太史文 著 侯旭东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幽灵的节日

中国中世纪的信仰与生活

The Ghost Festival in Medieval China

幽灵的节日

中国中世纪的信仰与生活

浙江人民出版社

[美] 太史文 著
侯旭东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幽灵的节日：中国中世纪的信仰与生活 / (美) 太史文
(Teiser, S.F.) 著；侯旭东译.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9
(外国学者笔下的传统中国)
书名原文：The Ghost Festival in Medieval China
ISBN 7-213-01767-5

I. 幽… II. ①太… ②侯… III. 盂兰盆会 - 研究 IV.
B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7510 号

幽灵的节日：中国中世纪的信仰与生活

[美]太史文 著 侯旭东 译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吴晓红
封面设计 顾 页
责任校对 鞠 朗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天电脑信息处理有限公司
(杭州武林路 125 号)
印 刷 杭州大众美术印刷厂
(杭州电厂路谢村)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9.6 万
插 页 1
印 数 1 - 4000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1767-5/B · 53
定 价 15.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太史文(Stephen F. Teiser)曾就学于欧柏林学院,1986年于普林斯顿大学宗教学系获博士学位。现任普林斯顿大学宗教学系教授。本书曾获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颁发的1988年宗教史领域最佳新作奖。1994年,他又出版了《十王经与中国中世纪佛教冥间的形成》一书。

“外国学者笔下的传统中国”总序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套丛书“外国学者笔下的传统中国”，是国外学者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新作，从研究的切入点和视角来看，它们应属社会史研究，这些书的翻译出版将对中国的社会史研究有所推动。

大约从 10 年前开始，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社会史丛书”，到现在已经出版了 5 批共 20 部中国学者的著作。我们要感谢主编蔡少卿教授和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因为这些著作对社会史领域做了初步的探索，为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复兴和繁荣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这些著作实际上也是一面镜子，能够反映出近 10 余年来国内社会史研究者的努力和成就。

以我个人的看法，尽管国内学者的社会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成绩是主要的，但还存在一些值得改进的问题。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虽然瞄准了“社会史”的研究课题，但其成果却缺乏新意，自始至终的描述和简单的因果分析，与传统史学没

有什么区别；一些研究课题偏大而空洞，缺乏个案实例的支撑，而另一些研究则缺乏通过对典型个案的剖析来解释比较重大的历史意义；一些研究不顾国际社会史同行的意见和已有成果，在那里自说自话，另一些研究则较轻率地、不加甄别地套用国外的或某些相邻学科的概念和方法。这些问题和偏差，一方面是因为对社会史的发展历史、性质等等基本问题认识不清，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真正的社会史研究实践不足，难以提供可供检验的范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社会史研究起源于欧美，从社会史研究的基本品质来说，这种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启蒙时代，因此无论沧桑变幻，那里的社会史研究发展历史毕竟要比我们的长些，经验教训要多些，认识与实践要成熟些。因此，了解欧美学者的社会史理论探讨和研究实践，对我们中国的社会史研究建设不无益处。早在10年前，蔡少卿教授就主持编译了一部论文集《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其中收集的文章大都是西方著名社会史家的重要文章，所探讨的问题也非常重要。这本书虽然没有列入“中国社会史丛书”，但我始终是把它作为丛书的“开篇”来读的，因为那些文章告诉我应该怎样理解社会史，怎样对“社会史研究”做出判断。由此又产生出一点感慨：尽管也有一些出版社零散地或个别地出版过一些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但似乎只有浙江人民出版社始终在这里用心，就像上海文艺出版社始终专注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著作的出版一样。一种学科或一个研究领域如果没有相对稳定的出版机构的长期支持，其影响和发展速度是要大打折扣的。

如果再把话说透一些，社会史的正确开展对中国历史学的

重新定向有着很大的关系。中国的历史学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学术取向？自从 80 年代初以来，中国史学界开始重新了解国际历史学术的动向，发现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国际史学的变化，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蔚为大观。这个变化就是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政治史模式和科学主义史观已经遭到了重大的挑战。具体的表现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已扩展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不是仅限于重大的政治事件、精英人物，其结果必然是研究视野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丰富多样。

在中国，新史学观早已传入，经济史范式的推广给予传统旧史学以重创。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以政治史（包括经济制度史、精英思想史）代替了整个社会的历史，以“重大”事件的历史代替了日常生活的历史，以农民战争史代替了人民群众在一切时间和一切领域里创造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史家的眼光始终是“自上而下”的，即使当他们偶尔关注普通人的历史时，那也是精英历史的附属、延续或者残余，或是不自觉地居高临下地审视它，而不是设身处地地同情它、理解它。这种眼光也导致我们首先热衷于寻找规律，然后把各种事实纳入这个规律之中，而不是在真正和全面了解事实的基础上总结规律。

与此相反，走向民间的历史学实际上就是“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也就是说，它强调“下”，但却不排斥“上”。所谓“下”，就是民间文化、基层社会、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它们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基础和主体。重大的政治事件只在历史上占极短暂的时间，精英和领袖不会超过总人口的 10%，如果我们忽视对“下”的研究，如果我们只强调重大事件对日常生活、精英人物对普通民众的影响，而不考虑前者是后者积累的结果，后者是前者的基础，那么我们的史学观必将是反历史的。幸运的是，近年来

这样一种态度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社会史研究的蓬勃兴起就是明证。但是我们的社会史研究刚刚起步，还有明显的认识上的偏差。比如说，我们有许多关于传统社会三教九流的出版物，就社会群体研究而言，这些选题都非常必要，但问题在于这里有不少有意追求冷僻、甚至（说得严重一点）带有猎奇猎艳的味道。这虽研究的是“下”，但却仍是“自上而下”的。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是把社会史简单地当作社会生活史，而不是当作全社会的历史或者年鉴学派所称的“整体历史”。

“自下而上”的或者“走向民间”的历史学绝不是狭义的社会史，“民间”并不是历史学研究的终点，而只是重要的一站，是走向整体历史或总体史学的必由之路，也是为了纠正以往史学研究中的偏差。这项任务将由更为广义的、作为历史学研究新范式的社会史来承担。社会史研究将强调综合和长时段研究的史学方法，一要把以往忽略的基层社会的历史、普通民众的历史、日常生活的历史和民间文化史掸去灰尘，重新放在适当的或者显要的位置；二要以“自下而上”的眼光重新审视和改造政治史学范式下的传统研究领域，比如说，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史这三大块中，更多侧重研究一些制度的实践或操作层面，更多考虑其结构—功能意义，而不是仅限于制度规定和沿革本身，要注意“说”的和“做”的之间的差距（实际上测量这个差距就很有意义）。再比如说，多考虑一些上层与下层之间的互动关系，像近年来国外汉学界较多研究传统社会中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关系（控制与反控制等等）那样；三要在研究的任何主题上，关注有关联的部分之间的横向或纵向联系，即如多年前有的学者主张的：“既要瞻前顾后，又要左顾右盼。”

走向民间的历史学并非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关注的都是

些微不足道的小问题。1926年顾颉刚先生就曾有针对性地指出：“我们决不因为古物是值钱的古董而特别宝贵它，也决不因为史料是帝王家的遗物而特别尊敬它，也决不因为风俗物品和歌谣是小玩意儿而轻蔑它。”实际上，我们关注占人口多数的普通民众，代表着一种人本主义的观念变革。在传统的政治史范式中，个别的普通人在“重大”事件中是微不足道的，人们对长平之战后坑杀的几十万人并不十分在意，更多地关注“秦王扫六合”。这在今天而言，不能说是公平的态度，因此需要彻底的改变。我们更关注日复一日的生活结构，关注人们的生活起居，关注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处理方式，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些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但社会关系复杂多变的时代，我们应该让每一个普通人、而不仅是领袖和精英，都能从他们感到熟悉和亲切的历史氛围中接受他们所需要的历史教诲。我们像关注大城市那样关注每一个小乡村，关注它的内部运作机制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方式；我们像关注每一个社会群体那样关注每一个个体，关注他在特定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位置，也关注他的内心世界。

我在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访问时，听到那里的学者对一位女博士的学位论文交口称赞——那是以清末民初山西的一位下层乡绅刘大鹏的日记为主要资料所做的研究。我问这篇论文好在哪里，他们告诉我说，它揭示了一个旧时代的乡绅在怎样学做一个民国人。

不知道对别人如何，但这至少对我是个引人深思的启示。

话说回来，这套“外国学者笔下的传统中国”可以视为“中国社会史丛书”的姊妹书系，通过它，我们可以看看外国学者是如何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以前我们总抱怨，只见介绍法国年

鉴学派,却见不到他们的具体研究著作。这里,我们陆续提供给学术界和一切爱好和关心中国社会史的朋友一些著作:它们所研究的都是中国大陆史学界较少探讨、却又比较重要的课题,它们的材料功夫都是扎实的,研究视角都是新颖的。我相信,中国学者一定能从这些著作中或多或少地受益。

应该指出,当我于1992—1993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访问并合作研究的时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翻译计划,并初步与有关学者和美国的出版机构进行了接触。在此期间,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的安·沃特纳教授(Ann Waltner)给予了很大支持,帮我进行过许多联系,为今天这套书的出版打下很好的基础。同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和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在版权转让方面也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和帮助,也需要给予真诚的感谢。我希望,在本译丛出版之后,能得到中外学者的大力支持,向本译丛推荐好书、好译者,使这套书在中国社会史研究历程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赵世瑜

1999年6月30日

译者序言

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述清初北京的“中元”云：

中元祭扫，尤胜清明。……庵观寺院，设盂兰会，传为目连僧救母日也。街巷搭苫高台、鬼王棚座，看演经文，施放焰口，以济孤魂。锦纸扎糊法船，长至七八十尺者，临池焚化。点燃河灯，谓以慈航普度。

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清末京城“中元”活动：

中元日各寺院制造法船，至晚焚之，有长至数丈者。

……各寺院设盂兰会，燃灯唪经，以度幽冥之沉沦者。

运河二闸，……至中元日例有盂兰会，扮演秧歌、狮子诸杂技。晚间沿河燃灯，谓之放河灯。

中元是道教的称呼，依佛教术语当叫盂兰盆节，更流行的说法则是鬼节，其时为阴历七月十五日。清末距今尚不满百年，但这种喧闹的节日场面距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已颇遥远，几已化作历史陈迹了。不过，半个多世纪以前，七月十五日的热闹景象几乎遍及全国。随手翻开《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各地“岁

时民俗”一目下七月十五日十之八九有节庆活动，北到黑龙江省的讷河县，南至海南省的琼山、文昌、定安、乐会、临高、感恩诸县都能见到它的踪影。每逢此日，诣先茔祭扫、挂钱、放河灯、作“盂兰会”则是少不了的内容。

这样一种全国性的节庆自然不会逃脱民俗学家乃至史家的注意。但略让人感到遗憾的是，介绍节庆活动的书籍、辞典虽多，加以认真研究的却寥若晨星。各种介绍内容繁简有别，实质大同小异。不外乎先叙佛、道经中的依据，次举史例，后接不同时期的节庆记载，只有事实的罗列，缺乏细致深入的分析。

古人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或是中国学者熟视无睹、罕加深思的原因吧。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则展示了一位当代美国学者对这个古老的中国节庆的理解。

本书作者身居大洋彼岸，可谓隔岸观火，从局外人的角度为读者勾勒出一幅与众不同的画面。作者心中盘旋的问题是中世纪（书中主要指唐代）鬼节在世间影响有多大？是不是仅庶民百姓才过此节？在不同背景的人眼中鬼节的意义是什么？它为什么能在中国久行不衰？这位旁观者不仅希望了解“是什么”，更想知道“为什么”。后者恰恰是局内人关心不够的。

此书连导论、结语共分八部分。导论既概括了全书主要内容，也阐明了作者的基本分析框架与思路。首先综述鬼节的主要活动、在中国及东亚流行情况与鬼节的多重意义，进而提出对中国社会中宗教形态的认识。作者采用了社会学家杨庆堃首倡的分析框架，即将社会中的宗教区分为“制度型”与“扩散型”两种，并加以修正来为鬼节定位，视之为涵盖了从扩散型宗教到制度型宗教的所有形式。由此引出对资料性质的关注，强调不同资料的价值，突出视角的多样性。最后由揭示宗教形态转到具体考察佛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如果说前一部分是以社会为背景分析宗教的话，这里则是立足于具体宗教来阐明它与

社会的关系。其中主要是对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核心见解是不应过份夸大中印宗教间的根本差异，无需过多纠缠于起源问题，而应把中国佛教，乃至鬼节视为一环环相扣，具有内在意义的整体。换言之，研究思路应从偏重历时性与发生学考察，转向对现象内涵做共时性的分析。

第二部分分别探讨了佛、道两教流行前中国本土七月的岁时风俗、印度佛教的安居以及道教七月份的活动，这些来源不同的活动后来均构成鬼节的一部分。作者意在说明七月半的鬼节是在本土传统基础上结合佛、道教的行事而产生的，它不纯为舶来品，而是有本土根源。

第三部分也是全书最长的一章，作者按时间先后列举了与鬼节有关的多种唐代文献，从岁时记、佛经（入藏的、藏外的）到诗、赋、正史、典章、经疏、讲经文、变文、仪轨与私人游记等。这些文献立场各异，流行于社会各种层面，自不同角度表达了对鬼节的理解。作者通过将各种文献并置一处，把鬼节的多彩画面与多重意义揭示出来，同时也使鬼节流行情形具体地展现出来。这即作者所说的“片断史”的叙述方法。以上两部分以历时性的分析为主。

后四部分则是更为综合性与共时性的分析。目连救母神话足以证明鬼节的合理性，第四部分集中讨论鬼节与《盂兰盆经》中译本出现前中国佛教神话中类似的题材。认为各种盂兰盆文献中涉及的大多数内容已见于早先的中国佛教神话，这些内容在鬼节流行前就已为社会上下不同背景的人们所熟知，所以，5世纪鬼节及目连神话出现后自然能广泛流行。

第五部分转而分析盂兰盆文献中的“目连”的形象。由佛教神话可知，不少佛子如优多罗、那舍及舍利弗的行为与目连相近，就是佛陀本人也有为亡母说法使之觉悟的经历，为什么不是这些人而是目连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此章解释了这个问

题。作者认为：“目连之所以风靡中国中世纪是因为他符合中国本土宗教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巫，亦因为他符合佛教圣人的理想。”（第 124 页）“目连在中国宗教中保持一中心位置是由于他将为不同社会阶级所能认可的巫的诸种形式集于一身。”（第 148 页）

第六部分考察盂兰盆文献中的宇宙观，主要围绕《目连救母变文》展开。指出变文中的宇宙观不是一个中国官僚与印度神祇的缺乏连贯性的拼合体，而已是一个一贯且经过整合的体系，它与佛教经论的正统观念有别，更接近于唐以后民间宗教的冥间世界。变文中的冥界对于目不识丁、以及在信仰上首先关注祖先当下处境及其在阴间前途的人最具吸引力。

第七部分讨论鬼节折射出的僧人与祖先崇拜、佛教与家庭的关系。认为节日的流行意味着僧人步入家庭宗教的核心，由社会的累赘、附属品变成家庭生活不可缺少的角色，成为交换循环的一环，这是中国社会划时代的大调整。僧人能起此作用，正是由于他们弃俗遁世。以上四部分从四个侧面解释了鬼节为何能广行于世。

结语部分从社会学、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角度讨论了本书的结论，提出不少有启发性的看法，如对“民间宗教”概念及运用的反思，提出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背景时应使用较“民间宗教”更为细致的概念，必须留意中国社会宗教生活中持久的成分，认为“只有当中国宗教的这些形式依据中国社会背景加以探讨时才会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第 195 页）并将鬼节解释为“通过礼仪”来说明节日中的诸多矛盾现象，作者还据鬼节发展的事实对衡量中国佛教发展的标准提出新见解，认为“关于佛教的轨迹必须包括比时间及思想更多的维度”，“佛教对中国社会更为普遍的影响见于那些不独为佛教所有的领域”。（第 201 页）

读罢此书，不能不佩服作者的眼光。作者并非就鬼节论鬼

节,而是将节日置入唐代社会的大背景中加以把握。在唐代,举国上下欢度鬼节,它确如作者再三指出的,宛如一面透镜,透过它可以看出不同人对节日的不同理解,种种不同理解赋予节日多重意义,自这些理解又可以发掘出宗教与社会的诸多信息,从而展现唐代社会多彩画面。

该书视角新颖独特,分析深入独到,一问世,佳评纷至。其贡献用克里曼(F. Kleeman)的话来说:“他对传统汉学及佛学领域的超越为未来中国宗教研究创立了一个新的模式。”由于本书成就突出,因而荣获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颁发的1988年度宗教史领域的最佳处女作奖。1996年该书又出版了平装本。这在美国汉学界也不多见。

本书作者太史文(Stephen F. Teiser)对中国读者来说可能还较陌生,但他近十年来在美国汉学界相当活跃且颇为出名。他早年毕业于欧柏林学院,1986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宗教学系获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中国中世纪宗教中的盂兰盆节》(该文北京图书馆有收藏,检索号为DA8610723),本书是在该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此后,他声名鹊起。1990年出版的巴斯韦尔(Robert Buswell)主编的《中国佛教疑伪经》一书由太史文审稿;《亚洲研究杂志》第54卷第2期(1995年5月)上的中国宗教研究评述中,由他负责介绍近些年西方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状况;1996年出版的《实践中的中国宗教》一书,由他撰写名为《中国宗教精神》(The Spirits of Chinese Religion)的长篇导论。1994年,他的又一部专著面世,题为《十王经与中国中世纪佛教冥间的形成》,其内容实为本书第六章之延伸与深化。中国唐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学术刊物《唐研究》亦聘请太史文任海外编委。他现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宗教学系,已获终身教职。

美国汉学家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曾说:“目前优秀的汉学家,往往将社会科学方法与文献学功底相结合,执于一偏

的学者都难有大的成就。”此书能够获得成功，正在于这种结合。

恰如作者在序言中所云，他试图使“一些全球性的思考与中国个案的独特性结合起来”。(第5页)在传统的汉学、佛学研究方法之外，作者直接受益于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选取节日作为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受到人类学的启发，宗教节日一向是人类学关注的重要课题。将节日置入社会背景中考察，注重共时性的分析又不难见到社会学方法的影响。他把鬼节视为具有多重意义的象征事件，是通过礼仪，亦是取资于人类学的理论。第三部分所采用的“片断史”的叙述方法多少可以看到人类学家格尔茨倡导的“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印记。最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并非简单地套用各种时髦的理论，而是依据史实慎思、明辨然后定取舍，在理论上也能有所建树。他分析鬼节在社会中的影响时放弃了几十年来流行的“民间宗教”与“大传统”二分的框架，转而采用杨庆堃提出的框架就是明显的一例。

从唐代史料看，上达皇帝下至百姓，各个阶层的成员七月十五日均欢度鬼节，节日乃是一种跨阶层的文化现象，如果按照“大传统”与“民间宗教”二元对立的分析思路，无论侧重哪一方来把握鬼节，难免顾此失彼，都不可能全面地揭示节日的意义。太史文注意到了这种传统思路的弊端，特别是“民间宗教”概念存在的问题，转而采用了杨说，并加以修正，将鬼节视为涵盖了从扩散型宗教到制度型宗教的所有形式，并采取“片断史”的叙述方式，从而借助节日可以了解到上至皇帝下及庶民生活与信仰的一个侧面。

近来西方学者反思“民间宗教”概念之缺陷的渐多，最近又有人提出了修补性的“共同宗教(common religion)”之说，指为不同阶层所分享的宗教现象，太史文笔下的鬼节实际就是“共同

宗教”的一种表现,不过他未使用此语。他的研究证明了共同宗教的存在,为新说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也为西方学者认识中国文化开辟了新思路。

本书突破了以往围绕经典、教义、高僧大德展开佛教史研究的旧模式,开拓了新领域,提供了新思路,代表了美国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新进展。

与欧洲、日本相比,美国学界研究中国佛教史起步较晚,起点也不高,但进展神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虽然早在 19 世纪末就出现了美国人对中国佛教的零星记载,但多为个人游历、观察所得,还谈不上规范的学术研究。真正的学术研究始于本世纪 40 年代,20 余年前故去的芮沃寿 (Arthur F. Wright) 是美国第一代治中国佛教史的学者,他的博士论文发表时篇幅不足 50 页,内容是关于十六国后赵时的神僧佛图澄的传记,基本属叙述性的作品。与他相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周一良先生的博士论文题为《中国的密教》,内容为赞宁《宋高僧传》中善无畏、金刚智与不空金刚三位传记的英译再加上一些考证性的附录,亦属叙述、考据之作。无论从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来看,均不能与欧洲、日本与中国相比肩。时隔半个世纪,情况则大为改观,总体水平如果还不能说超过日本、欧洲的话,至少可与之相媲美。近些年更是新作迭出。看看汤普森 (Laurence G. Thompson) 编的两本论著目录,前一本收至 1980 年,续编收 1981—1990 年,比较两书中佛教部分的数量与题目,便不难看出 80 年代以来美国汉学家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他们研究的不少领域中国学者涉足不多甚至未曾涉及,太史文之书即是一例,其新著亦如是。又如对中国佛教疑伪经,美国学者近来颇为重视,成果不少,巴斯韦尔主编的论文集《中国佛教疑伪经》对数种疑伪经典做了专题研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德野京子 (Kyoko Tokuno) 的博士论文 (1994 年) 是对《提谓波利经》的专题研究,这方面的工作,日本